

[主頁](#) > [出版](#) > [講台](#) > 性工作十年

性工作十年

轉瞬間，香港回歸已十年了，在這十多年間香港飽經風雨。而與此同時，一棵生命力頑強的紫藤花亦在這十年風雨中漸漸茁壯成長。

經過了十年的默默耕耘，性工作者權益運動總算取得了一些進展。透過不斷的落區活動、在學校及團體之間的教育、以及利用不同媒體為性工作者「平反」，姐仔的聲音走進社會，公眾亦有機會認識到性工作。而對於姐仔而言，透過一連串的參與，她們對工作的認同感增加了，對自己的權利意識亦有所提升，這亦是我們一直希望見到的。

你或會懷疑：在這十年間，性工作者仍是「見光死」，更遑論得到什麼保障吧。那麼，紫藤的工作豈不起不到作用？其實不然。性工作者運動無論對外(面向社會、團體)和對內(與性工作者的交流)，十年來，都取得了不少進展。

十年性工業轉變

在過去十年內，性工作者的人數不斷上升，在1997年，從事性工作的女士人數只得12000人(Lethbridge, 1997)，但到了2001年已上升至200,000人。(Ziteng, 2006)。當中包括「企街」(在街頭工作)、「一樓一」(在單位內獨自工作)、跑鐘(電召)、卡拉OK、夜總會、指壓中心、按摩院及桑拿浴場等。

性工作者的人數近年不斷上升，當中很多是新移民婦女，而性工作者人數上升有三個原因：第一，香港的經濟轉型，導致大量人口失業，一些早年從事製衣及零售業的婦女在失業後難以轉型，為了維持家計，便投身性行業；第二，自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後，兩岸三地的交往日益頻繁，內地人到香港工作的機會亦相對增加了。一些內地新來港的婦女學歷不高又缺乏謀生技能，加上居港又未滿7年，不能申領綜援，只有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養家，令投入性工作的人數不斷增加；第三，隨「社會發展，性行業近年來亦不斷出現新服務類型：例如以往性服務只集中在夜總會、卡拉OK、桑拿浴場等，但現在還有網站、援交、私鐘等新服務，五花八門的新服務令原本艱難的經營環境更雪上加霜。

要讓性工作者有勇氣站出來去面对公眾，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對現行政策的不滿，實在是困難重重。除了要面對警察和部分政治團體的打壓外，最令她們洩氣的，是社會大眾對她們的歧視目光，各種道德批判和政策打壓在十年間並未有遏止，致使性工作者的生存空間更形狹窄。

公眾教育方面

一直以來，社會對姐仔的描述總離不開貪慕虛榮、吸毒、被黑社會操控、破壞别人家庭和不道德等。即使是一些女性主義者，都會認為性工作會助長男性對女性的剝削，姐仔不應靠性工作為生，應該自主。然而，長期以來媒體的負面報導和描述，令社會大眾對姐仔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抗拒和排斥。事實上，性工作者的有很高自主性，女性藉此體驗身體自主，突破性別的枷鎖，使她們能按勞得值，用身體去賺取金錢，自食其力。真正剝削她們的，是歧視和不公平的法律，令姐仔成為社會上最邊緣的一群。因此，我們一直不遺餘力地把姐仔的聲音帶到社會裡，展示她們的面貌，讓姐仔們能夠發聲，透過社會與姐仔們的互相接觸，改變大眾對姐仔們的固有想法。

為了這個信念，紫藤在十年來不斷做好公眾教育的工作，透過各種類型的活動，把我們的想法傳到公眾裡去。

其中義工訓練是我們最初經常舉辦的活動。，我們相信透過不同人士與姐仔的接觸，可以改變大家對姐仔的想法。我們向義工強調義工訓練的目的，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來拯救姐仔的，更不能抱著「參觀動物國」的心態去偷窺姐仔。此外，我們會讓義工們參與一系列的外展活動，透過事後的討論讓他們有不斷反思的機會。

然而，最初在籌辦各種形式的公眾教育活動時困難重重。首先，社會上對性工作的看法十分負面，連基本的討論空間也沒有，更遑論進行公眾教育。因此，我們利用各種方法去爭取舉辦活動的機會。其中一個最常用的途徑是到大學舉行講座，透過姐仔和學生的親身對話去改變大家對姐仔的印象。但當中的最大的難題是姐仔的親身參與，因為大多數的性工作者都不願意曝光，害怕會碰到家人和朋友，會令自己和家人受壓，所以要說服她們參與實在有一定的困難。即使有姐仔願意出席講座，部分學生們的尖銳提問和不尊重的態度，例如：「你為什麼要做『雞』？」、「你知道什麼是尊嚴嗎？」這些充滿侮辱及傷害的問題往往會令一些姐仔不願再參與講座。幸好當中亦有些姐仔不怕面對批評，願意堅持到最後，透過進行大學講座為自己發聲，現時，每學期不同學院不同學系都會安排我們和姐仔到大學講課。而近年，學生們對姐仔的態度亦漸趨正面，在面對姐仔時，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懂得肯定和尊重姐仔，這對姐仔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而部分熱心的學生更會主動接觸我們，參與義工和各項活動，為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

我們深信，義工訓練是世代相傳的。經過多年的義工訓練，一些多年前參與訓練的義工學生，現在已在社會上擔當各種職位，有的成為了教師、社工等，在不同層面為性工作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近年，我們不斷擴大義工的層面，向不同的團體如婦女、勞工、青少年團體等招募義工，擴大我們的義工網絡。

除了應邀到各大專院校進行講座外，我們還會透過不同形式去消除大家對姐仔的負面看法；例如舉辦首屆性工作者電影節，透過放映電影和短片，嘗試打破主流電影對性工作者的刻板形象；出版書籍刊物如《性是牛油和麵包》、《亞洲性坊間》、《雙程心事——十二位中國性工作者記述》等，赤裸裸地向公眾展現姐仔的生活，讓大眾明白到性工作者面對的處境和問題，姐仔的工作和你我的無異，同樣是一份工作，都是要付出勞力，才得到金錢，性工作者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

近年來，公眾教育已漸見成果，當中的最大的轉變是在語言用詞上，大眾明顯已較以前客氣，由以往的「北姑」、「雞」、「妓女」，到現在部分社會媒體和社會人士已經開始使用「性工作者」這個較尊重和接納的名稱。這個轉變不單單是紫藤的努力成果，亦有賴各團體和熱心人士多年來的支持。

政治方面

性工作在以往得不到政客的支持，更甚者，一些政黨團體會利用「掃黃」去爭取市民的支持，以爭取選票。為了停止這些對性工作者的壓迫，紫藤曾於2000年發表「立法會選舉婦女政綱」，要求議員保障基層婦女權益，支持性工作非刑事化；其後，我們更發表了「抗議政客迫害性工作者聯署聲明」抗議一些政黨團體以打擊性工作者為籍口去爭取選票；又與民間團體合辦不同活動，例如在「國際人權日」當天頒「偽人權獎」給政黨，諷刺那些無理打壓姐仔的政黨。

在多年來，我們不斷游說議員，希望他們正視性工作者的問題。但在最初，大部分議員都只表示他們可以「閉門」支持性工作者，但卻不能公開表示支持。經過多年的努力，現在已有數位議員願意公開關注及支持性工作者，雖然仍屬少數，但我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政客、議員願意改變對性工作者的歧視偏見，為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

為了讓國際社會關注本港性工作者所面對的人權問題，我們定期發表提交有關姐仔情況的報告，例如提交影子報告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希望以國際壓力促使香港政府正視性工作者被剝別人權的情況；特別是警察濫用職權打擊性工作者。

這一系列的行動引起了社會對性工作者的討論和關注：譬如一部份政客已開始關注警察對性工作者濫權的問題；性工作者被迫害更令性工作者問題成為香港十大人權個案之一，這些無疑已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轉變，但大部份政客對性工作者仍是不接納，甚至仍然以打擊姐仔來賺取政治籌碼，而姐仔被剝削基本權利亦屢見不鮮，故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絕不會鬆懈下來。

社會運動方面

過去10年，政府不斷分化社會，令邊緣群體互相仇視、歧視。例如在社會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一些低收入人士會歧視伸縮線援的人，批評「綜援養懶人」，但同時，綜援人士亦會埋怨內地的新移民分薄了社會的資源。在大家怨聲載道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增加諒解、互相支持和團結去抗衡政府的分化。

社運的發展中，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嘗試走進社運圈，成為當中的一分子。我們一直認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亦是勞工一份子，因此，我們積極參與各項爭取勞工權益和公民權益的行動：例如「三、八婦女節」活動、「五．一遊行」、「七．一大遊行」等。除此以外，紫藤亦有支持其他團體的遊行爭取，例如支持本地婦女團體的「反對暴力對待婦女」；支援參與同志團體舉辦的「國際不再恐同日」等，回歸十年民間團體的聚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讓姐仔與不同社運團體的成員作身接觸、互相了解，藉著與其他團體的交流連結，彼此支持、提高姐仔的公民意識。

在爭取性工作者權益的路途上，由以往性工作者的權利得不到任何重視到現在已開始引起關注，一些戰友更不惜反主流，在不同崗位給我們支持，雖然主流社運團體之間仍不大接納姐仔，但憑著各方友好的逐漸支持，才可令性工作者成為社運的一份子。

文化方面

除了積極的權益爭取外，軟性的文化活動對喚起大家對性工作的關注亦十分重要。近年，紫藤應一些電台節目的邀請，向公眾介紹性工作和本港性工業的情況，讓公眾了解性工作或行業內的獨有文化。與女同盟合辦的網上電台節目，更為姐仔們、客人、馬伕等提供了與大眾交流的平台。

2003年，我們舉辦「我的生活——性工作者攝影展」，由姐仔自己透過相片向公眾呈現自己生活的一部份，讓姐仔能向公眾表達自己，與社會人士直接對話。這個活動最初只是一個姐仔們的內部活動，後來，影展的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展出，當中包括一些「上等」的地方，例如文化中心、藝術中心等，讓大家明白姐仔們的作品也能登「大雅之堂」。在影展中，不少姐仔也透過作品寫出了自己的心聲：與他人一樣，在她們的生活當中，同樣有期望、有掙扎、有家人、有自己所想所做、有興趣...而性工作只是她們生活的一部分。她們的分享引起了社會大眾的不少回響，讓更多人了解到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其實和我們一樣都是人，理應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尊重。

除了電影節外，我們亦有利用不同的媒介例如電台節目、話劇、甚至是印製T恤、poster、postcard 等去講述姐仔的故事和表達我們的訴求，令更多人聽到姐仔的聲音。

可惜的是，在推動文化活動之際，我們往往受到政府部門的打壓和阻撓。例如舉行攝影展時，文化中心要求我們在展品上貼上「家長指引」的告示，然而，我們的展品並沒有任何裸露成分，場內有其他展品含裸露成分，卻無需要有「家長指引」，為何大家在面對以性工作為題材的展品時，會帶有雙重標準呢？由此可見，大家對性工作本身存在偏見。又例如在第一屆香港性工作者電影節中，我們遭到食環處為難，企圖以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阻延電影節進行。一直以來不同的團體亦有舉辦類似電影播放活動(包括青年中心、婦女團體及社區團體等)，何以執法部門從未對這些團體執法，但卻針對紫藤舉行是次電影節選擇性執法，打壓邊緣群體的活動。然而，我們相信越是被打擊就越需要在當中創造生存空間。

事實上，文化是由我們的生活所衍生出來，以藝術文化活動作為橋樑，我們便能進一步把性工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連繫起來，讓大眾能以多角度認識性工作和性工作者。而這一連串的活動亦會帶動主流社會想法的轉變，例如近年有不少藝術工作者選擇以正面和人性化的角度製作有關性工作／性工作者的電影和書籍，令市民能有更多新角度認識性工作／性工作者。有見及此，縱使我們推動文化活動時常遭受阻撓，但我們仍會努力堅持。

法律及政策方面

姐仔們面對最大的問題是警察濫權及法律的打壓。一直以來，姐仔們時常要面對警察的無理打壓，被誣告、被毆打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更甚者，警察在放蛇時還會接受性服務。面對這些情況，姐仔往往只能啞忍，投訴無門。因為香港那套自相矛盾的法律，既沒有定性工作為非法，但又嚴禁「賣淫場所」、「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及「依靠妓女為生」，影響性工作者謀生。這種自相矛盾同時製造了更多機會予執法者和違法人士欺壓性工作者，令她們面對劫掠和暴力時不敢向執法部門求助，更甚者，警察還利用職權，以「有限度的身體接觸」為借口，在「放蛇」時接受手淫服務，口交和性交。警察又恃著社會對性工作者的偏見，及她們對自身權利之不認識，肆意侮辱她們，甚至插蠟嫁禍，以安全套作為證據，逮捕性工作者。

在面對種種不公平的情況，首先要做的是讓姐姐仔認識法例和自己的權利，意識到問題是源於執法制度的不公平。可幸的是，在過程中，一些清楚現況的姐姐仔對打壓她們的法制開始感到不滿，願意一同行動，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我們亦見到越來越多姐姐仔挺身維護自己的權益，願意去打官司、投訴警察。

然而，她們的投訴往往是不得要領。有些姐仔在投訴後因身份曝光，遭到警察的報復、騷擾，令她們終日提心吊膽，難以繼續工作。當中李婉儀事件便是一慘痛例子，她被警務人員冤枉、誣告、毆打、毀滅證據，而負責放蛇的警察更曾接受口交服務，她不甘被屈而自殺身亡。她被誣告受辱而死已有2週年，她的家人從不間斷地為她投訴，向社會大眾公開事件，揭露警察濫權的問題，可是至今仍未收到警察投訴科的調查報告。

又如像一些外勞姐姐仔亦時常被警察迫害。警察往往乘她們不懂法律，在沒有足夠證據下便無理拘捕她們，軟硬兼施地迫她們簽紙認罪。若她們拒絕簽認罪，便把她們拘留最少3個月直至開始審訊，然而，審訊過程倉促，平均三分鐘完成審訊，又不容許姐仔答辯，姐仔根本沒有公平的法律對待。在重重關卡、又不想等候審訊期間坐牢的情況下，外勞姐仔都放棄審訊，受屈認罪。

其實法律的原意是用作保障性工作者，讓她們免受欺壓。然而，現時的法律往往被用作打壓性工作者，使她們失去生存空間。例如在2007年，警察積極打壓網站和大樓業主，美其名是打擊操控性工作者集團，但被捕者大部分都是性工作者、無牌按摩或有兩個姐妹一起工作的姐姐仔。由此可見，警方目的其實是令性工作者無法經營，他們濫用法律去打壓性工作者。

為針對各種無理打壓性工作者的法律，我們舉辦法律研討會，商討修改現行的法律，改變性工作者的不利地位。例如在2003年舉辦「讓我坦蕩蕩-法律研討會」、在2006年我們舉辦了「千言萬語--性工作與法律」會議，邀請海外(性工作)運動分子、工會研究人員、法律學者解釋他們國家的所行的法律，透過認識其他國家的不同法律模式和經驗，為本地的公眾和法律制定人士帶來新思維，讓他們制定更理想的性工作政策及法律。

另外，爭取性工作非刑事化亦是我們一直所堅持的。只有消除一切打壓性工作者的刑事條例，取消不完整、偽善的刑事條例，使不同方式經營的性工作者都能獲得法律保障，才能有效保障性工作者和尊重性工作成為一個普通行業。

性工作者的自我提升

除了對外的工作，實際知道性工作者的想法，並鼓勵她們自身參與，那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這十年間來，我們從未間斷對內培訓及組織性工作者。

回望這十年，由最初透過外展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職業訓練班、聯誼康樂活動、親子活動等，讓姐仔彼此認識，逐漸建立自己的網絡。慢慢地，姐仔開始勇於作自身參與，例如投稿到報章刊物和學生報等，使自己的故事、聲音傳到公眾。另外，亦與不同團體作交流，如女工、被虐婦女、同志團體、宗教團體、人權組織、以至專業人士如社工等，透過與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而在國際社會中，香港姐仔的聲音亦開始響亮，她們在國際妓權會議中發聲之餘，亦會出席一些國際性的論壇和會議，例如愛滋會議，社會論壇等，向國際社會講解本港性工作者的情況和關注議題，並學習不同國家的文化和論壇工作者爭取權益的經驗，回來後再作分享和分析。

經歷以上種種，她們對自己權益的意識開始日漸提升，會走到街上反對所有對性工作者的暴力，亦會有自信地和立法會議員講述自己遇到的處境和困難。姐姐仔自身的參與才是最能引起社會關注和打動人心的原素。

在組織姐姐仔的過程中，亦是困難重重的。由於工作員對姐姐仔的情況未能全然掌握，再加上經驗不足，以致初期頻頻碰壁。加上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和工時長所限，影響到她們的參與，多年來，不少姐姐仔只能斷斷續續地支持我們的工作，幸好一些核心成員仍然堅持參與，為自己和其他姐仔出力，維護及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一切成果，都多得姐姐仔們的體諒，以及她們不輕言放棄的恆心。

十年來，姐姐仔由「見光死」到有人能夠站出來去為自己爭取權益，這個轉變，引證著性工作運動開始漸見曙光。今天，真正屬於性工作者的「姐姐仔會」正式成立，姐姐仔進一步為自己當家做主，組織自己，期望能藉著討論與性行業息息相關的政策和法例，策劃相關行動為業界爭取權益，為同業提供適當支援。我們相信隨著「姐姐仔會」的成立，能連結到更多的姐姐仔，一同謀取性工作者的福祉。

未來面對的困難

默默耕耘了十年，紫藤的爭取漸見成果。然而，相較於姐姐仔而言，紫藤所面對的困難實在是微不足道，姐姐仔仍被打壓，面對的被打壓情況亦未有顯著的改善。

首先是警察濫權的情況多年來仍未有改善，而所改變的，只是他們打壓姐仔的形式。例如以往警察會直接以姐仔為打壓目標，但近年，他們轉為打壓與性工作者相關的商業，例如網站、業主及地產，令性工作者無法經營，最終被趕絕，無以為生。這些「另類」的欺壓手法，相信會不斷持續。

其次是姐仔在媒體曝光的限制。姐姐仔以往「隱姓埋名」，到現在敢於為自己爭取權益、發聲，其間最大的掙扎便是在媒體前表露身份的問題。直至現時，姐姐仔在媒體前，仍然要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只因便是在鼓勵姐仔站出來發出观点和政視，一旦自己的身份曝光，不但自己，連身邊的親人、朋友均會受人白眼和歧視。其主因便是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支持社會接受性工作工作是工作，仍會是我們今後的爭取方向。我們一方面會繼續爭取性工作非刑事化，即從事性工作不再是罪，性工作者能夠除去現時的人事污名。我們更會不斷參考外國的成功經驗，取它們的成功經驗注入本地的爭取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亦會繼續從文化入手，把文化藝術活動和性工作互相扣連，讓社會大眾以多元化的角度去看性工作，重新認識及接納性工作。

與此同時，開拓社會對「性」的討論空間，亦是我們今後的其中一個工作方向。我們深信，要社會接納性工作工作是工作，能夠正常化地公開談性，打破大眾的性禁忌是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近期積極舉辦各類有關性愛和性教育的工作坊、設立性教育資源中心，予普羅市民一個公開談性和增進性知識的機會，讓性不再成為社會的禁忌。

我們亦會繼續紫藤一向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對抗警察濫權，教育姐仔如何面對警察的欺凌，並透過不同的渠道，如立法會、申訴部、聯合國等等，投訴警察利用職權「免費嫖」，用盡一切可行的方式去表達性工作者的訴求，為她們爭取應有的尊重 and 尊嚴，並繼續呼籲不同階層的人士包括客人、基層人士等，和我們一同關注姐仔，支持她們爭取權益，身體力行參與支持姐仔的行動。

此外，我們亦希望社會大眾能給予姐仔鼓勵和支持。最基本的是對姐仔有一份基本的尊重，視性工作為工作，視姐仔為社會的一份子，這對她們來說絕對是一份莫大的鼓舞。

在姐姐仔、各方戰友的支持下，紫藤渡過了十個年頭。在以後的每個十年，紫藤都希望能繼續與大家一同前進。

Twit

https://twitter.com/Zi_Teng_hk

電話

+852-2332-7182

傳真

+852-2390-4628

e-mail

ziteng@hkstar.com

Copyright © 2000-2021 ZI TENG. All Rights Reserved.